

臺灣的旅行文學， 為何獨厚 1990 年代？

撰文 | 蘇碩斌

與臺灣有關係的旅人為行旅留下文學，歷史很長久。清初康熙年間來臺的官宦，如郁永河的《裨海紀遊》，日治時期出國見識世界的臺灣人，如林獻堂的《環球遊記》，都是著名的案例，數量也不算少。不過，總還不能說是潮流，更難形成一種文類。臺灣真正把「旅行文學」衝成琅琅上口的概念，蔚為新興文類的現象級產出，是1990年代。

旅行文學，何以成為一種文類？

真的是1990年代。因為清末的郁永河、日治的林獻堂，以及較近的戰後遊記名家陳之藩或鍾梅音等等，都不曾使用「旅行文學」這四個字來形容自己的寫作風格。作為專有名詞的這四個字，第一次出現應是1987年，宋冬陽為散文集《島嶼之夢》作序的標題〈精神版圖的擴張與再擴張——論林文義的旅行文學〉，只不過內文並無定義何為旅行文學，當時也沒立即形成潮流。

到1990年代，情況就不一樣了。暖身是在1996年《幼獅文藝》，有接續三期刊載散文學者胡錦媛〈繞著地球跑：當代臺灣

旅遊文學〉系列文章，拉出議題的氣勢；1997年學術期刊《中外文學》推出「離與返的辯證：旅行文學與評論」專輯，宋美瑋、陳長房、賴維菁、李鴻瓊四位學者以西方文學實例為旅行文學再下定義。真正爆發熱浪的，是兩大國籍航空公司接連密集舉辦的「旅行文學獎」——1997年起連三屆的「華航旅行文學獎」及三本文集、1998年的「長榮寰宇文學獎」及一冊文集。

這回「旅行文學」的風火一點燃就熱燒至少十年，學術研討會多達十餘場、論文發表上百篇，各種單篇創作、評論、報導不曾斷過，至今餘溫猶在，絕對是一種現象無疑。

為何旅行文學獨厚1990年代？都在寫些什麼？作品是否折射了時代？大略有跡可循，答案不妨先寫在前面——這些旅行文學多在強調「旅行的苦痛」。這個答案看似普通，但若併同臺灣的1990年代，其實是「觀光的享樂」躍起的年代，其間的心情就很微妙了。

臺灣政府開放一般國民海外觀光，是1979年的事，當年約有四十八萬人以觀光名義出國。來到1995年，短短十六年間，臺灣的出國人數已突破五百萬人。

臺灣出版界為迎合其中追求深度的出國旅客，開始大量出版旅遊書，最具代表性的是《民生報》連載「國外自助旅行系列」，以及旅遊雜誌《BLANCA 博覽

家》、《TO'GO》、《MOOK》創刊，還有遠流引譯英國DK出版社的《全視野世界旅行圖鑑》系列、自製「Moving概念旅人」書系；城邦集團馬可孛羅出版「旅行及旅行文學專門書」；精英出版社出版「個人旅行系列」指南並代理日本《JTB世界自由行》旅遊指南，以及太雅、華成、閱讀地球等新興的觀光書籍出版社成立——以上，全數都在1990年代發生。

所以，華航與長榮二家臺灣航空公司，聯手《中國時報》、《聯合報》及出版社，以高額獎金、優厚機票、誘人曝光機會推出「旅行文學獎」，無疑是最華麗的一刻，也是「旅行文學」真正成為一個咖的歷史證詞。



苦痛的旅行與作家的「反觀光」姿態

接下來要談「旅行文學」出生在「觀光時代」的弔詭之前，先做個字義辨析：旅行 (Travel) 和觀光 (Tour) 二字，日常雖常混用，但歷史源流和理論意義卻是相反。旅行的拉丁文字源 *trepalium*，是三塊木板夾住的意思，即酷刑，因此旅行本義是「苦痛」，僧侶、軍旅和苦力的移動是典型。觀光則源自希臘文字根 *tornus*，與現今英文 *turn* 同意，指前去某地方再復返，因此意謂暫離工作稍事休息，寓義「享樂」。

臺灣1990年代的旅行文學幾乎都強調不凡旅程、苦痛經驗的「反觀光」感受，放回當時臺灣「大眾享樂觀光」高度盛行的情境來看，真的頗為微妙。

作家張讓1996年在《中華日報》副刊的一篇〈旅人的眼睛〉，是最早浮現的反觀光情懷之一。她在散文就明白寫了：

我不喜歡一般所謂的觀光，……六年前到法國旅行，在巴黎街上奔走找尋名勝，好像被誰逼著一站一站向前趕，突然醒悟這樣觀光庸俗而又荒謬。

這種反觀光的旅行文學風格，在1997年後的兩大旅行文學獎，徹底發揮。

第一屆華航旅行文學獎的評審、詩人楊澤就寫「深刻的旅行文學讓我們不致為導覽手冊、風景明信片所左右」；第二屆華航旅行文學獎評審南方朔也表示「現代儘管觀光事業發達，但緊跟著導遊旗而栖栖惶惶的蜻蜓點水，它除了具有『到此一遊』的印象外，無論留存的記憶或體會到的經驗都並不太多」，評審羅智成更指摘前一屆旅行文學獎「旅行難度低、廣度不夠、深度不夠」。

長榮環宇文學獎評審詹宏志也寫道：「當我讀著這些決賽作品時，委實吃了一驚，……作品中還有很大的比例是來自參加旅行團的觀光客，就算中間有若干自助旅行者，他們對於旅行了解和體會顯然也才起步。」

上述評審對享樂觀光的嚴苛批判立場，相當一致。是的，旅行的人，不能跟著觀光團失去自我，不能上車睡覺下車尿尿買藥！評審對旅行文學的要求，是更高更難、更艱辛更苦痛的「反觀光」。

旅行文學獎得獎作品中的旅行觀

得獎作品會呈現什麼內蘊，應該就不難想像了。第一屆華航旅行文學獎首獎是舒國治的〈香港獨遊〉。他在文中清楚表達了個人漫遊風格，並努力呈現避開旅遊書經常點名的觀光景點之心境——刻意不去陸羽飲茶樓，不看匯豐銀行、中國銀行、力寶大廈等新建築，不看文武廟、洪聖古廟等著名古蹟。

第二屆華航旅行文學獎首獎是湯世鏞的〈魔鬼·上帝·印第安〉，文中不僅流露出對觀光客的不屑，甚至對「時下年輕人所流行的自助旅行」也不屑，因為他肯認的是更艱辛的背包旅行，「絕不是那種享受的、休閒的、觀光的旅遊，它是『身遊四方，心求一理』的旅行。……飯店四五星、出門大小車，只是缺個導遊而已，這算哪門子的『自助』！」

第三屆華航旅行文學獎首獎是林志豪的〈異地眾生〉，文章中表達了對印度一般景點的高度失望，他的文字透露的反觀光心情是，「不時詰問自己這趟旅行究竟想尋求什麼，對旅遊指南的作者和攝影師滿是怨懟」。獲得該旅行文學獎優等獎的是

紀大偉〈美國的盡頭〉，寫他辛苦抵達墨西哥著名旅遊城市笛花納的失望，他無法忍耐廉價虛假的觀光街景，所以攔下計程車，要求司機「不要去『葛林果』去的地方。要去墨西哥人真正愛去的地方。要去年輕人喜歡的地方。」葛林果是拉丁美洲人稱呼美國人的詞彙，在這裡意指花錢出國享樂觀光的美國佬。

這些得獎作品的內蘊，映照了評審的「反觀光」感受。就這樣，臺灣的旅行文學，獨特地誕生在1990年代。因為，知識分子置身大眾出國享樂時代，從而萌生不安的心理，創造出反觀光的旅行文學。

蘇碩斌

臺大臺文所教授，研究領域為文學社會學、文化研究、創造性非虛構寫作等，著有《看不見與看得見的臺北》、譯有《文學社會學》、主編《終戰那一天》等書。

註：本文部分內容曾以學術論文形式發表於《臺灣文學研究學報》第十九期（2014.10）。